

# 司马迁音乐思想研究

杨兆贵<sup>1</sup>，李倩宁<sup>2</sup>

(1. 澳门大学 教育学院，中国 澳门；2. 圣三一拉邦音乐舞蹈学院，英国 伦敦)

**摘要：**《乐记》《乐论》《史记·乐书》对音乐理论持相同看法的部分，可视为先秦汉代儒家对音乐理论共同看法的表述。学者研究司马迁的音乐思想，一般只根据《史记·乐书》一文，但该文是否司马迁亲笔所写，历来争论不休。《史记·乐书》从开头到“世多有，故不论”应是司马迁所写，其内容反映了司马迁的音乐思想；其他部分的内容与《乐记》相同，即便是“司马迁的草稿”，也不能反映其对音乐的独特看法。《史记》其他篇章记载的与音乐相关的史事都能反映司马迁的音乐观。司马迁的音乐思想主要有：唐舜、西周既是政治理想的时代，又是音乐的理想时代；以节制私欲为制乐原则；音乐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政治良窳导致不同类型的音乐出现；音乐与民情民俗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司马迁；音乐思想；《史记·乐书》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22)01-0127-08

**DOI:**10.14058/j.cnki.tzsk.2022.01.018

中国音乐发展源远流长。自商周以来，乐器、乐律等都有发展<sup>[1]</sup>。先秦至汉代，思想家们不断建构、修正、发展音乐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从现存材料来看，先秦、汉代的音乐思想不是单纯地从音乐角度论述音乐理论的，而主要是从政治、社会、教化等角度阐述的。《史记·乐书》“太史公曰”所说：“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sup>①</sup>这可谓一语中的。司马迁对音乐理论有较高的造诣，也有一套理论，然而学者在研究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在查阅两岸学术期刊时，笔者发现关于司马迁音乐思想的研究文章不超过20篇。因此，本文通过研究《乐记》《乐论》《乐书》的关系以及司马迁与《乐书》的关系，阐述司马迁的音乐思想，以期能填补司马迁音乐思想研究的不足。

## 一、《乐记》《乐论》《乐书》的关系

司马迁音乐思想的研究，应当以《史记·乐书》为主要的研究材料。但学界对《乐书》的作者、成篇年代历来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是司马迁亲笔，有的学者认为是后人补缀。另外，《乐书》内容基本上与《礼记·乐记》相同，大部分与《荀子·乐论》相同，有的学者认为这3篇著作互相抄袭。有鉴于此，在论述司马迁的音乐思想前，我们有必要先厘清两个问题：一是这三篇著作的关系；二是司马迁与《乐书》的关系。

### (一)《礼记·乐记》与《荀子·乐论》的关系

针对这两篇文章有700多字内容完全相同的情况，历来学者多讨论谁抄谁的问题，近来

收稿日期：2021-07-02

作者简介：杨兆贵（1971—），男，福建漳浦人，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学者侧重考辨两者的异同。黄意明发现两者在情感教育方面有 3 个区别:《乐记》更强调“乐”来自人情,是内在感情的发动;《乐记》明确确立“乐”的形上根据;它们对人性的看法不尽相同,《乐论》主要持自然人性论,《乐记》则兼自然人性论与性善论<sup>[2]</sup>。李慧子对两者关系的看法基本与黄意明相同,并指出两者都认为乐是人情的表现,乐教有和睦人际关系、移风易俗的功效;《乐论》写于《乐记》之后<sup>[3]112-113</sup>。王祎在比较《乐论》《乐记》在文本、音乐思想上的异同后,认为与《乐记》相比,荀子“乐与情通”的看法更深刻,对音乐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说得比较系统,且更兼顾乐与德的关系;《乐记》则对音乐的本质、功能定位的看法比较全面。两篇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sup>[4]110-113</sup>。李荫指出,《乐记》重点对音乐与人心、伦理、政治的关系及礼与乐的不同作用进行论述,突出音乐陶冶性情和安定社会的双重功能;《乐论》主要论述礼乐的起源、音乐与人情的关系、音乐的中和之美与教化功能<sup>[5]</sup>。王齐洲认为《乐论》《乐记》同源异流,其思想都来自荀子,而写成于荀子弟子,两者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sup>[6]</sup>。

## (二)《史记·乐书》与《礼记·乐记》的关系

学者对《史记·乐书》与《礼记·乐记》关系的研究极少。王祎在比较《乐书》《乐记》文本后,发现两者主要有 4 个方面的不同:篇节顺序有所不同;《乐书》补充“卫灵公濮上听乐”一节;《乐书》开头结尾加“太史公曰”;两篇文章使用的字词不同,但不影响原意<sup>[4]113-131</sup>。不过,笔者比较这两篇文章,认为《乐书》有些字词的使用比《乐记》优胜,如《乐书》“商乱则捶,其臣坏”的“臣”比《乐记》“商乱则陂,其官坏”的“官”优胜,因上文说“宫为君,商为臣”。王祎还指出,《乐书》并非全盘照抄《乐记》,其思想重点是表达以国家社稷为重的“乐政之道”<sup>[4]131-135</sup>。

由于《乐书》写作年代比较清楚(汉代),而《乐记》成篇年代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乐书》成篇年代比《乐记》晚。先秦、汉代典籍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些篇章的文字或句子与其他篇章的相同或相近。对此,学者一般认为成书较晚的书、篇抄袭前代作品。其实,先秦汉代没有抄袭这种观念,当时作者认为传世文献的部分段落或句子与自己的思想吻合,就会直接或间接摘录下来,并写在自己的作品中。我们可用文学研究法研究这种文献或文学现象。文学研究法包括三方面:一是撰写手法研究,即如何采取文学技巧安排和收集材料,使这些材料成为一篇作品;二是作者、作品的思想与思想背景研究;三是文体研究<sup>[7]</sup>。

上述学者从文本、思想的异同来比较《乐记》《乐论》《乐书》,是值得借鉴的方法。因此,笔者认为三者对音乐理论持相同看法的部分,可视为先秦汉代儒家对音乐理论的共同看法。

## 二、司马迁与《乐书》的关系

在《史记》的传统研究方面,学者认为司马迁与《乐书》的关系大致有 4 种情况。

一是司马迁作《乐书》。明代茅坤、清代郭嵩焘持此主张。前者认为司马迁作《乐书》是“特述《乐记》之言而成文”<sup>[8]1779</sup>。后者认为《礼书》《乐书》“皆采缀旧文为之”<sup>[8]1782</sup>。

二是司马迁作《乐书》部分内容,其他部分由褚少孙补充。清代方苞持此看法,他感慨于司马迁批评汉武帝“不能损满持盈,极情纵欲”,认为褚少孙“乃疑其辞事之未终而续焉”<sup>[8]1780</sup>。现代学者刘咸炘、韩兆琦指出《乐书》由开头至“世多有,故不论”句是《乐书》之序,“为司马迁所作无疑”<sup>[8]1784</sup>。

三是《乐书》乃司马迁的草稿。南宋吕祖谦持此见。他认为“自‘凡音之起’而下,则草具而未成者也”<sup>[8]1779</sup>。

四是《乐书》非司马迁所作。南宋唐仲友、清代梁玉绳和吴汝纶等持此见。唐仲友赞成《汉书·司马迁传》“《史记》十篇,有录无书”说<sup>[8]1779</sup>。梁玉绳指出《乐书》所记的汲黯、公孙弘之事不合史实,“《乐书》全缺,此乃后人所补,托之太史公也”<sup>[8]1781</sup>。现代学者如杨冬菊也持此说法<sup>[9]</sup>。

### 三、司马迁的音乐思想

由上可见,尽管学者对《乐书》与司马迁的关系看法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乐书》由开头至“世多有,故不论”的部分是司马迁所写,其后的内容与《乐记》基本上相同,除了个别字词不同、个别章节次序有所调动。笔者认为,要研究司马迁的音乐思想,除了这段确定为司马迁所写的文字,也应把《史记》属于司马迁所写的且与音乐有关材料,一并加以讨论<sup>②</sup>。基于学界对司马迁音乐思想寥寥无几的研究,本文希望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更全面、深入地阐释司马迁的音乐思想。

#### (一) 研究回顾

学界研究司马迁音乐思想的论文也很少。陈四海、董菲指出司马迁继承传统儒家音乐观,推崇民间音乐术人,为艺人著说立传<sup>[10]</sup>。杨冬菊认为司马迁的音乐思想包括音乐的社会功能,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以及倡导雅颂之音、崇尚音乐“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思想等内容<sup>[9]48-50</sup>,而且“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了一个先例,他第一个为艺人著说立传,写下《佞幸列传》和《滑稽列传》,使我们得以在几千年后依然能够详细地了解当时风光无限的音乐家李延年以及名震一时的优孟、郭舍人等俳优人”<sup>[11]</sup>。李波认为司马迁既坚持以儒家标准对音乐发展史、历代音乐制作者、一般历史人物的音乐活动等进行批评,又肯定情感在音乐中的个性抒发<sup>[12]</sup>。张琪和王永航在考察司马迁音乐思想后认为:“结合党中央以优秀的文化作品引导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方向,涌现了各类各样的优秀音乐作品。这在笔者看来正是司马迁音乐理念中的‘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的体现。”<sup>[13]</sup>

#### (二) 司马迁的音乐思想

笔者认为,《乐书》由开头到“世多有,故不论”是司马迁所写,这一部分的内容反映了司马迁的音乐思想;其他部分的内容与《乐记》相同,即便是“司马迁的草稿”,也不能反映出其对音乐的独特看法;《史记》其他篇章记载的与音乐相关的史事都能反映司马迁的音乐观。本文汇集《史记》中所有与音乐有关的史料,以此论述司马迁的音乐思想。

##### 1. 舜、西周既是政治的理想时代,又是音乐的理想时代

司马迁在《陈杞世家》中称赞“舜之德可谓至矣!禅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在《游侠列传》中称赞舜是“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在《夏本纪》中记载皋陶和帝舜作歌相互告诫;在《乐书》中称赞舜当天子时,重提“君臣相敕,维是几安”,即君臣互相勉励,国家才能安定。

周成王痛惜三监之乱给国家带来的危难,于是谨慎修德,善于守成,彻底消灭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巩固了周室在东方的统治。所以,司马迁在《乐书》中称赞周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

司马迁称赞周公是“大德”:“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周公不因贫窘而修炼道德,不因富足而放弃礼仪,逸乐时想起初时的艰辛,平安时不忘创业的危險。故《无逸》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

乃逸, 则知小人之依”, 即强调君主要先了解农民耕种和收获的艰辛、生活的疾苦, 然后才能享受安逸的生活。司马迁极推崇周公, 认为他是孝子的典范, 也是三代道统的代表, 这其实也是西汉儒家的共同看法<sup>[4]</sup>。司马迁赞成古书所说“治定功成, 礼乐乃兴”之言, 实际上他应是针对周公说的<sup>③</sup>。

综上所述, 司马迁认为舜、西周是政治、音乐的理想时代, 舜、周公、周成王是理想的君主, 他们的道德和作为对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2. 制作音乐的原则是“以损减为乐”和节制、节欲

司马迁在《乐书》里说:“海内人道益深, 其德益至, 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 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 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 以损减为乐, 乐其如此也。”他认为人的道德水平越高, 所追求的娱乐就越不相同。他反对凡事做到极端, 主张“谦退”“损减”, 并以此为制乐的原则。

司马迁这一看法, 应与其深受《老子》《易传》的影响以及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有关。司马迁认为商纣、六国“流沔沉佚”以及秦二世“尤以为娱”而导致“丧身灭宗”, 因此反对过分沉湎, 主张节制、减损。他在《殷本纪》中批评商纣滥用淫乐, 认为“作新淫声, 北里之舞, 靡靡之乐”是纣亡的原因之一。秦二世听信赵高之言, 赵高说:“五帝、三王乐各殊名, 示不相袭。上自朝廷, 下至人民, 得以接欢喜, 合殷勤, 非此和说通, 解泽不流, 亦各一世之化, 度时之乐, 何必华山之騷耳而后行远乎?”赵高指出五帝、三王的音乐各有不同的名称, 以示互不相沿之意; 音乐有交流欢乐感情、融洽亲切情意、传布恩泽之效, 每一时代有自己的教化, 有适合自己的音乐。这番话本来是有道理的, 问题是赵高并没提出秦代应有什么特点的音乐, 反而为秦二世沉溺声色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秦朝灭亡有很多原因, 其中与音乐有关的是秦二世“恣心长夜”, 通宵达旦地放纵情欲。商纣、秦二世因沉湎音乐而导致政权覆灭, 是他们的共同点。

司马迁不仅反对天子、君王过分沉湎音乐, 而且批评为迎合上意而创作新声的音乐人。他批评“为变新声”“善承意”的李延年。李延年是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 也是佞幸之臣。《孝武本纪》记武帝灭南越后, “祷祠泰一、后土, 始用乐舞, 益召歌儿, 作二十五弦瑟及箜篌瑟自此起”。《乐书》记载, 武帝命作《郊祀歌》19首, 歌词多尔雅之文, “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 皆集会《五经》家, 相与共讲习读之, 乃能通知其意”, 可见《郊祀歌》文辞相当古雅深奥, 必须由通晓五经的专家一起研读讨论, 才能完全理解。李延年拜为协律都尉, 次序其声。他必先了解这些古奥歌辞的内涵, 才能“序其声”, 这足见他在古文、韵律、音乐方面造诣极高。《佞幸列传》说:“延年善歌, 为变新声, 而上方兴天地祠, 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 弦次初诗。”当时汉武帝热衷于祭祀天地鬼神, 《封禅书》记载:“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 然羁縻不绝, 冀遇其真。自此之后, 方士言神祠者弥众, 然其效可睹矣。”武帝为求成仙而做出不少荒唐之事, 行为与秦始皇相同, 费事且无用。方苞批评武帝“席文景之盛, 不能损满持盈, 极情纵欲, 穷兵四远”, 所作所为与先王“万民咸荡涤邪秽以饰厥性者异矣”<sup>[8]1780</sup>。

司马迁还以节制、节欲为原则论衡古今音乐的发展。他在《乐书》中批评六国“流沔沈佚”“秦二世尤以为娱”, 而欣赏汉惠、文、景帝对音乐的无所作为, 说“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 于乐府习常肆旧而已”。音乐对统治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统治者充分利用雅颂之类音乐的正常功能, 那么音乐能起到移风易俗、“助流教化”之用; 反之, 如果统治者纵情声乐, 沉溺郑卫之音一类的音乐, 那么就可能导致政权覆灭。因此, 司马迁的音乐史观,

有着深沉的历史和思想内涵。

### 3. 音乐与政治密切相关

司马迁认为音乐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政治清明, 音乐才和正。舜时“君臣相敕, 维是几安”, 君臣互相勉励, 国家安定。《五帝本纪》称赞“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是天下理想政德开始的帝王。当时, “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 致异物, 凤皇来翔”。四海升平则音乐祥和, 也即《传》所说“治定功成, 礼乐乃兴”, 也即《乐记》《乐书》《诗大序》所说的“治世之音安以乐, 其正和”。

相反, 如果政治腐败, 则淫乐出现。司马迁说: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乐记》说: “郑卫之音, 乱世之音也, 比于慢矣。”儒家认为郑卫之音是接近于轻忽怠慢那一类型的音乐<sup>[15]</sup>。即使圣人孔子曾经“退正乐以诱世, 作五章以刺时, 犹莫之化”, 即孔子即便通过整理诗乐劝诫世人, 并创作诗歌以讽刺时政, 也不能改变时风。司马迁认为, 如果君主对郑卫之音不加节制, 太过沉湎, 可能导致政权崩溃, 纣王与秦二世就是典型人物, “轻积细过, 恣心长夜”, 结果导致政权灭亡。

《乐书》说: “乐者, 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礼乐刑政, 其极一也,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都是君主统治的工具, 且目标是一致的, 即统一民心, 建立太平治世。这段文字可看作司马迁对音乐与政治关系密切说法的补充。

### 4. 音乐与民情民俗密切相关

司马迁在《乐书》中指出: “以为州异国殊, 情习不同, 故博采风俗, 协比声律, 以补短移化, 助流政教。”可见, 司马迁承认各地习俗不同, 民歌有异。中央政府收集各地民歌, 调和声律的高低清浊, 合成乐歌, 目的是补救时弊、移风易俗, 有助于政令教化的推行。司马迁的这种说法有其深刻的道德论思想——“天子躬于明堂临观, 而万民咸荡涤邪秽, 斟酌饱满, 以饰厥性”, 即希望百姓在音乐熏陶中清除心灵污浊。

此外, 从“海内人道益深, 其德益至, 所乐者益异……天子躬于明堂临观, 而万民咸荡涤邪秽”这段话来看, 司马迁认为人性并非完善, 甚至有性恶论的倾向。他在《货殖列传》中说: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 口欲穷刍豢之味, 身安逸乐, 而心夸矜孰能之荣使。”综览《史记》全书, 可见司马迁的人性论比较复杂: 他既继承荀子的性恶论, 肯定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共性, 认为谋利是人性的本源; 又继承孟子的性善论, 认为人为义而舍生, 并以孟子的仁义标准去衡量君子<sup>[16]</sup>。其实, 孟子性善、荀子性恶论皆发端于周公。周公的人性论认为人有为善或为恶的可能, 从而影响了孟子、荀子的人性论<sup>[17]</sup>。可见, “天子躬于明堂临观, 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所反映的人性论, 也是司马迁接受先秦儒家人性论的部分内容。

## 四、司马迁对传统音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 (一) 政治方面

#### 1. 司马迁认为音乐与政治有密切关系

《乐书》说: “治世之音安以乐, 其正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正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声音之道, 与正通矣……舜作五弦之琴, 以歌《南风》; 夔始作乐, 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 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 五谷时孰, 然后赏之以乐……《大章》, 章之也; 《咸池》, 备也; 《韶》, 继也; 《夏》, 大也; 殷周之乐尽也。”《大章》是尧时之乐, 以彰显尧德; 《咸池》是黄帝之乐, 尧加以增修, 彰示黄帝尧帝美德备施; 《韶》是舜时之乐,

表示舜能继承尧德;《夏》是禹时之乐,歌颂禹能光大尧舜之德。可见五帝时期帝王的德行极高,音乐都反映、歌颂当时帝王的崇高品德。

## 2. 司马迁认为每个时代的音乐都有自己的特点

司马迁在《乐书》中讲述了舜至汉武期间音乐的发展、变化,如《雅》《颂》时期“音理而民正”,春秋战国时期“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秦二世时“尤以为娱”,汉惠、文、景时“习常肆旧”,因循而已。《乐书》《乐记》都说:“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 3. 司马迁认为音乐与政权兴亡有关

司马迁认为秦二世沉溺声色,是导致秦亡的原因之一。这种看法应继承了《吕氏春秋·古乐》篇对音乐的看法:“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贤者以亡。”两种不同的音乐导致两种不同的政治后果:贤者昌隆,不贤者败亡。

## 4. 司马迁以音乐比喻政治伦理

司马迁在《田敬仲完世家》中记述了邹忌告诉齐威王关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这里把君、相、政令、四时等与音乐相比拟。《乐书》也有类似的比喻:“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愆戾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捶,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乐书》从声律谐乱的原理说明人事治乱的现象,在《乐记》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 (二) 道德方面

司马迁认为音乐与君主的道德有密切关系,还把音乐与政治伦理相比拟。舜、周公、周成王都是理想的君王,所以他们时代的音乐雅正。

司马迁的这种看法,继承了孔子和荀子之见。孔子重视乐教,在《论语·泰伯》中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主张学乐以修己,教乐以成人。孔子认为推行乐教,能使所有人受音乐熏陶,各自完善人格,内心提升至一个和谐、高尚的精神生活境界。孔子重视仁,主张“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仁德的表现。其音乐思想主要包括重视仁德,提倡雅乐,诗礼相辅<sup>[18]66-69</sup>。荀子认为音乐可以影响道德,其音乐思想主要有寓教于乐,提升人格;以乐辅治,促进生产<sup>[18]79-81</sup>。《乐论》说:“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美好的音乐可以提高道德修养。《礼论》说:“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趋中《韶》《护》,所以养耳也。”荀子所提倡的音乐应既能表现天地、自然的和谐,又能体现崇高道德、呵护情感的品格。所以,《乐论》又说:“君子以钟鼓导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毛,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可见,孔子、荀子都认为音乐教化对提升个人的道德境界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司马迁接受了此观念,并不断地加以强调。

### (三) 人心和人性方面

心、性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虽然周公没直接谈心性,但《周书》相关篇章已蕴含着心性论,为儒、道、法等先秦诸子导其先路<sup>[19]</sup>。先秦诸子对心性的研究颇深,而司马迁又对先秦诸子的学说有深入了解。

司马迁认为音乐可使清除百姓心灵中的污浊,修养他们的情操。他在《乐书》中所说的“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观点应继承自申叔和荀子。《国语·楚语上·申叔

时论傅太子之道》记申叔时之言“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认为学习音乐是为了扫除污秽之气，提升净化心灵。荀子也有相同的看法。《乐论》说先王为了防乱，制《雅》《颂》之声，“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乐行而志清”，即音乐可以提升人的心志，使之更加清明。李慧子认为荀子所说的心包括认知心、情欲心、道德心、意志心，四心合作而合于道。音乐可以提升这四种心的能力<sup>[3]58-67</sup>。荀子《乐论》认为音乐可以提升人的道德心和起节制作用的意志心：“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

另外，司马迁认为人很容易受外在环境（包括音乐）的影响。他说：“《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噪噉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雅》《正》音乐得到整理，民风就端正；激奋的呼声一兴起，士卒就振奋；郑卫之音一起唱，人心就流于放荡。可见，不同类型的音乐对人心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这种看法，《乐记》《乐论》都有提及。《乐记》说：“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乐书》所记与此相同，但把“反躬”写成了“反己”。《乐论》也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

司马迁说百姓受雅正音乐影响，由“万民咸荡涤邪秽”“以饰厥性”可见他认为人性并非完善，这明显是受了荀子的影响。荀子主张性恶论，《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性恶论<sup>[20]</sup>。

#### （四）制乐方面

司马迁主张以节欲为制乐原则，“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以损减为乐”。这应是受了《老子》《易传》《乐论》《乐记》等的影响。《老子》第15章说“保此道者不欲盈”，意思是保持“道”的人不自满，才能去故更新<sup>[21]119</sup>；第45章说“大盈若冲”，意思是最充盈的东西像是空虚一样<sup>[21]237</sup>，人的境界越高就越内敛、谦虚；第48章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意思是为道要摒除偏执妄见，开阔心胸，探讨事物的本根，提升人的精神境界<sup>[21]245</sup>。《谦·彖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乐论》说：“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乐书》《乐记》也说：“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这说明礼的作用是节制人的好恶之情、节制人的心志，因而先王制定丧礼、婚礼、射礼等，应“礼节民心，乐和民声”。

#### （五）音乐分类方面

司马迁把音乐分为官乐和民乐，其中官乐又分为正乐和淫乐。他说：“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从乐理来看，《雅》《颂》之音理为正乐，郑卫之曲为淫乐。《荀子·乐论》把音乐分为正、邪两种：正音中正和平、肃穆庄严，包括《雅》《颂》之声，邪音妖冶轻浮、淫荡轻慢。“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乐姚冶以险，则民流慢鄙贱矣。流慢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故礼乐废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吕氏春秋·古乐》也把音乐分为正、淫两种，即“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

综上所述，《史记·乐书》《礼记·乐记》《荀子·乐论》三者内容虽有重叠、相合之处，但《乐记》《乐论》各有侧重点；《乐书》并非照抄《乐记》，里面有些思想、文字、段落有所

不同;《乐书》由开头到“世多有,故不论”是司马迁所写。研究司马迁的音乐思想不能只以《乐书》这段文字为限,应结合整本《史记》相关材料进行论述。司马迁的音乐思想主要有:唐舜、西周既是政治理想的时代,又是音乐的理想时代;以节制私欲为制乐原则;音乐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政治良窳导致不同类型的音乐出现;音乐与民情民俗有密切的关系;音乐影响着人心和人性。当然,司马迁的音乐思想有其理论渊源,主要是受《乐记》《乐论》的影响,其次是《老子》《易传》《吕氏春秋》等音乐理论的影响。

#### 注释:

- ① 本文涉及的先秦、汉代典籍内容引自香港中文大学汉达文库,下文不再对其标注。
- ② 学者谓《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今本这10篇是后人所补,而非司马迁所写,因此,讨论司马迁的音乐思想,不应把它们包括在内。
- ③ 伏胜《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7年,前3年救平叛乱,第4年推行封建,第5年营建洛邑,第6年制礼作乐。这就是说周公是在“治定功成”而制礼作乐的。《乐书》《乐记》写作“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与此稍异。

#### 参考文献:

- [1] 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01-206.
- [2] 黄意明.《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思想比较[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8(1):95-100.
- [3] 李慧子.乐与道:荀子乐论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5.
- [4] 王祎.《礼记·乐记》研究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5] 李荫.《礼记·乐记》与《荀子·乐论》乐教思想及其现实意义[D].郑州:郑州大学,2016.
- [6] 王齐洲.《礼记·乐记》作者及其与《荀子·乐论》之关系[J].中山大学学报,2019(5):77-87.
- [7] 杨兆贵.《鹖冠子·世兵》篇非抄袭贾谊《鹏鸟赋》辨[J].中国文学研究,2009(3):50-54.
- [8] 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 [9] 杨冬菊.司马迁《史记·乐书》音乐思想解读[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9(2):47-50.
- [10] 陈四海,董菲.论司马迁的音乐思想[J].人民音乐,2010(10):88-91.
- [11] 杨冬菊.司马迁笔下的音乐人——李延年[J].音乐天地,2016(7):50-53.
- [12] 李波.司马迁音乐批评思想初探[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105(23):63-68.
- [13] 张琪,王永航.司马迁音乐思想与当代文宣歌曲创作[J].当代音乐,2015(2):18-19.
- [14] 杨兆贵,吴学忠.西汉儒家政治、文化视域下的周公与孔子:以《汉书》为论述中心[J].南都学坛,2020(2):1-12.
- [15] 冯洁轩.论郑卫之音[J].音乐研究,1984(1):67-84.
- [16] 贾行宪.司马迁的人性思想初探[J].延安大学学报,1984(2):28-34.
- [17] 杨兆贵.儒家修齐治平思想溯源:论周公对孔、孟及其他儒家的影响[C]//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修身齐家到天下一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联合国学校,2017:166-181.
- [18] 黄如敏.先秦时期的乐教思想研究[D].云林:云林科技大学,2011.
- [19] 杨兆贵.周公心性论甄微[J].南都学坛,2016(1):26-32.
- [20] 蔡仲德.论孟荀的礼乐思想[J].孔子研究,1988(1):61-70.
- [21]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 牛建兵]